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成果

中国乡村可持续发展： 理论分析与制度选择

苗长虹 主编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前言

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国社会经济跨世纪发展的基本战略之一，而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是这一战略的根本保证和优先领域。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过新中国 50 年来的奋斗努力，我国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新中国是在一个贫穷、落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传统农业社会的基础上开始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工农矛盾、城乡矛盾一直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结构矛盾。受旧中国遗留和新中国特殊发展环境的影响，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逐渐形成了制度化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从而使农业、农村、农民这一发展中社会发展的普遍问题在我国更加突出，并成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热点和难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乡二元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人口众多、资源紧缺、效益低下、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城乡失调等问题始终困扰着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进程构成严重制约。因此，如何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促进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就成为决定和影响国民经济现代化进程的重大课题。

社会经济实践和学术理论研究均表明，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实现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目标，依赖于两个基本因素：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的增长和产业化发展、乡村工业化的“异军突起”、乡村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均离不开这两个基本因素。由于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快速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正处于形成之中，各种形式的制度创新异常活跃，对技术进步的决定性作用也日益显现。因而，我们选择了制度因素作为本书分析的主线，试图通过对农业和乡村可持续发展若干重要领域：人口与贫困、资源与环境、农业产业化、乡村工业化、乡村城镇化、乡村土地利用、城乡关系和贸易等方面存在问题及其成因的分析，从总体上努力构建我国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变迁方向。

本书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工业持续发展机理与调控模式研究”（项目号 49501007）的一个基础理论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单一的农业发展战略或者单一的乡村工业化战略，均不能有效解决我国突出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必须采取内生的、综合的乡村整体发展战略，才能促进农业和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本项目研究工作中，我们将研究的理论视野从农村工业拓展到整个乡村系统，并立足于转型时期城乡关系的调整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

本书在研究、撰写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首先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研究经费的支持，感谢河南大学对出版经费的资助，感谢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研究生处、科研处、人事处等单位对本研究所提供的诸多方便；还要感谢南京大学的曾尊固教授、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郭焕成教授、河南大学的李润田教授、黄以柱教授、李小建教授、马建华教授、李永文教授、千怀遂教授、张德宗教授、沈卫威教授

以及许多同事，他们对本研究给予了热情的鼓励、指导和帮助；最后，还要特别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张于嫣女士，没有她的督促和认真的编辑，本书是不可能顺利出版的。

全书思路和提纲由主编提出并经过全体研究人员的多次讨论确定。各章节编写人员的分工如下：苗长虹，第一章和第八章的第一、二、三节以及第五节的一部分；陈德广，第二章；刘玉振、乔家君，第三章；乔家君，第四章；徐勇，第五章；李学鑫，第六章和第八章的第四节以及第五节的一部分；张晓平，第七章。各章初稿完成后，由主编通稿定稿，并对许多章节的内容进行了重写。书中观点由各有关作者负责，而科学上的错误由主编承担。由于本研究涉及面广，因素复杂，限于时间、资料和研究水平，书中缺点甚至错误在所难免，欢迎各界批评赐教。

苗长虹

1999年5月于开封

目 录

前言	i
第一章 乡村与乡村可持续发展	1
第一节 基本概念	1
第二节 乡村可持续发展分析的理论框架	7
第三节 中国乡村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实现的艰巨性	13
第四节 中国乡村可持续发展与制度选择	15
第二章 乡村人口、贫困与乡村可持续发展	21
第一节 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21
第二节 乡村可持续发展中的人口与贫困	27
第三节 乡村人口与贫困问题的成因	32
第四节 消除贫困, 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制度选择	36
第三章 乡村资源环境与乡村可持续发展	43
第一节 乡村资源环境在乡村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43
第二节 我国乡村资源环境的特点与问题	45
第三节 乡村资源环境问题的成因分析	48
第四节 乡村资源环境的制度建设	53
第四章 农业产业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59
第一节 农业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挑战	59
第二节 农业产业化及其在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63
第三节 农业产业化的机制	68
第四节 农业产业化的制度创新	73
第五章 乡村工业化与乡村工业可持续发展	79
第一节 乡村工业、乡村工业化与乡村工业可持续发展	79
第二节 乡村工业化的过程与运行机制	82
第三节 乡村工业与发展环境	87
第四节 乡村工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93
第五节 乡村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创新	97

第六章 乡村城市化与乡村住区可持续发展 105

第一节 乡村城市化、乡村住区与乡村住区可持续发展 105

第二节 乡村城市化的机制 110

第三节 乡村城市化道路与乡村住区可持续发展 118

第四节 乡村城市化与乡村住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选择 121

第七章 土地可持续利用与乡村可持续发展 129

第一节 土地与乡村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129

第二节 乡村土地可持续利用的结构 135

第三节 乡村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因素 140

第四节 乡村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制度创新 144

第八章 城乡关系、贸易与乡村可持续发展 151

第一节 城乡可持续发展的相互依存 151

第二节 城乡关系的演变与冲突 153

第三节 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制度选择 158

第四节 贸易对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推动与制约 161

第五节 比较优势与贸易自由化趋势下的政策调整 168

参考文献 177

第一章 乡村与乡村可持续发展

《中国 21 世纪议程》指出，农业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和优先领域。中国是发展中的农业大国，7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乡村，在从传统向现代、从乡村向城市、从封闭向开放、从计划向市场、从粗放向集约等社会经济快速转型的重要时期，能否实现乡村发展并保持其可持续性，直接影响乃至决定着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第一节 基本概念

一、乡村、城市与乡村—城市连续体

1. 乡村与城市

伴随着非农经济活动的展开和现代化的推进，当代乡村迎来了一个多变化、多样化和复杂化的新时代。作为与城市相对应的一个地域概念，人们往往将二者对比进行理解。可以说，有多少种城市的定义，就存在着多少种乡村的定义。人们通常认为，城市是“具有一定的人口和建筑、绿化、交通等用地规模，第二及第三产业高度集聚的、以非农人口为主的居民点”，而乡村则是“人口密度较低，聚居规模较小，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基础，社会结构相对较简单、类同，居民生活方式及景观与城市有明显差别”的地区综合体（左大康，1990：672~673，697~698）。马克思指出：“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一些社会学者曾将乡村与城市的差别概括为九个方面：（1）职业不同；（2）环境不同；（3）地域社会的规模不同；（4）人口密度不同；（5）居民的社会——心理特征中的同质性和异质性不同；（6）社会分化、阶层复杂性不同；（7）社会流动不同；（8）移居方向性不同；（9）社会互动体系不同（P.A.Sorokin, C.C.Zimmerman, and C.J.Galpin, 1930）。然而，伴随着技术的加速进步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快速转变，城市和乡村的内涵及差别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城乡对立和城乡差别是人们关注的重要主题，而在后工业社会尤其是知识社会时代，城乡融合和一体化则构成了人们看待城市和乡村的基本视角。因此，城市和乡村这一对相辅相承的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它需要从发展的、动态的观点进行认识和理解。

2. 乡村—城市连续体

城市和乡村两分法为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地域空间作出了简明的概括，城市地域和乡村地域构成了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两个基本地域单元。然而，尽管人们可以从职业与功能属性、生态环境状况、社会文化构成等多个侧面来界定二者之间的界线，但由于乡村

和城市的动态性、不整合性和相对性（张小林，1998），这种两分法也为人们城乡划分的实际操作和城乡关系的科学认识带来了许多困难。一些社会学家早在本世纪初就提出了乡村因素和城市因素是处在一个连续体上的认识，尽管在 50~60 年代对这一认识曾有过争论，但伴随着一系列城市问题和乡村问题的出现，社会学、地理学和城市与区域规划学等相关领域的学者，日益强调乡村与城市的相互依存，对乡村—城市连续体的认识也日益深化。如社会学认为，在乡村—城市连续体这一意义上，乡村（村落）的定义实际就是乡村度（村落度）的定义，而城市的定义则是城市度的定义，现实存在的村和镇存在着村落度高低的差别，现实存在的城市也存在着城市度高低的不同，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等社会变动，村落的村落度逐渐下降，而城市度则不断上升（富永健一，1992：202~205）。又如在地学和城市与区域规划领域，城市—区域是一有机系统的观点已成为进行城市与区域研究和规划的基本视角。由于本项研究的对象是乡村而非城市，基于乡村—城市连续体的观点，这一连续体可以被看作是由乡村、乡村城市、城市边缘区和城市组成的一个变化着的混合体，当代意义上的乡村，应该包括乡村、乡村城市、城市边缘区这三大块，当代意义上的城市应该包括城市、城市边缘区、乡村城市这三大块（苗长虹，1997：21~22）。因此，本研究中的乡村概念泛指区域中心城市建成区以外的广大地域系统。

二、发展、可持续性与可持续发展

1. 发展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发挥人的潜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很早就是先哲们追求的理想。黑格尔曾指出：“社会和国家的目的在于使一切人类的潜能以及一切个人的能力在一切方面和一切方向都可以得到发展和表现”（黑格尔，1979：59）。但“发展”与“增长”作为经济学概念，只是在经过 50 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后才逐渐明晰。托达罗认为：“发展必须包括经济的加速增长，缩小不平等状况和消灭绝对贫困，也包括社会结构、公众观念和国家制度这些主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从本质上说，发展必须体现变化的全部内容。通过这些变化，整个社会系统应面向系统内的个人和集团的多种多样的基本需求和愿望，使大家普遍觉得原来不满意的生活条件已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变得都向更好一些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转变”（托达罗，1988：124）。70 年代以来，人们不仅明确了“增长”与“发展”的区别，而且更进一步强调了发展的人文性、整体性、内生性、综合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79 年在厄瓜多尔的基多召开的研究“综合发展观”的专家会议和会后由佩鲁撰写的《新发展观》一书，对这种发展思想作出了系统的说明。发展是以社会—人的发展为中心的，发展不仅应促进人的物质需求，而且应满足人的社会、文化与精神需求。按古莱特的认识，发展包含着三种核心价值，即生存、自尊和自由（D. Gault, 1973），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这三种核心价值不断实现和逐步提高的过程。而 80 年代以来，伴随着人们对南北差距扩大、人口爆炸、资源紧缺、环境污染、贫困加剧等一系列全球问题的关注，关于“发展”的研究开始进入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新时代，发展的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等一些全新概念由此应运而生。

2. 可持续性、不确定性与无知

发展过程能否在一个无限长的时期内保持下去？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会不会中断？关

于人类社会未来命运的讨论促成了“可持续性”这一概念的产生。由于发展过程至少会受到经济、社会、生态三方面因素的制约（胡涛等，1995：i~ii），发展过程要持续下去，这三方面系统的结构就不能失去动态平衡。从经济上讲，经济系统只有收益超出成本才能持续下去；从社会文化上讲，社会系统只有保持社会和文化体系的稳定、减少不同文化之间的毁灭性碰撞才能持续下去；从生态上讲，生态系统只有保持生态系统稳定和动态平衡才能持续下去（张坤民，1997：20）。然而，发展所受到的经济、社会、生态限制之间又是相互制约的，不能将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因素割裂开来。因此，经济意义上的可持续性是指“在保持自然资源的质量和其所提供服务的前提下，使经济发展净收益最大化”

（E.B.Barbier,1985）；社会意义的可持续性是指在经济体系和生态系统的动态作用下，“人类生命可以无限延续，人类个体可以充分发展，人类文化可以发展”（M. Munasinghe and J. Mcmeely,1996:19~56）；生态意义上的可持续性是指为了当代和后代的经济进步，为将来提供尽可能多的选择，“维持或提高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完整性”（M. Munasinghe and W.Shearer,1996）。从经济、社会、生态综合来看，发展的可持续性也可通过“留给后代人不少于当代人所拥有的机会”来界定，而人类的选择机会依赖于其所拥有的资本。萨拉格丁认为，人类社会至少存在四种类型的资本：（1）人造资本，如财政与经济；（2）自然资本，如自然资源；（3）人力资本，如对个人的教育、卫生健康和营养方面的投资；（4）社会资本，如一个社会发挥作用的文化基础和制度等。因而，可持续性可理解为“我们留给后代人的以上四种资本的总和不少于我们这一代人所拥有的资本总和”（I.Sarageldin,1996）。

发展的可持续性促使人们从过去强调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转向重视发展过程中经济、社会与生态之间的协调。尽管不同学科基于自身的科学基础对可持续性所强调的侧面有所差别，但均离不开生命支持系统这一基础，均强调发展与生态系统的相互依存，经济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依存。然而，由于人类认识能力和现有认识水平的限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和尚未为人所知的东西，因而人们并不完全知道实现发展可持续性的充分条件是什么，甚至人们对必要条件的认识也是残缺不全的。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WF)在其著名的《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一书中指出：“当人们把某活动说成是持续的时候，这通常是基于这些人当时的知识而言。由于许多因素是不可知的或者难以预料的，根本不可能保证某一项活动永远持续下去。因此，我们应该得出结论：如果我们采取的行动影响到了环境，我们就要谨慎行事，我们要对这种行动的结果进行仔细研究，迅速吸取教训”（1992：3）。可见，可持续性面临着不确定性和无知的严峻挑战。所谓不确定性，根据奈特的定义（F.K.Knight,1965），是指“在任何一瞬间个人能够创造的那些可被意识到的可能状态之数量”。福尔勒（R.D.Fuerle,1988）提出，存在三个“不确定性定律”，即人口上的不确定性定律、时间上的不确定性定律和初始条件的不确定性定律，其含义是：如果相互作用的人数增加，则不确定性呈指数提高；如果某个人进行选择，则不确定性随时间迈进未来的跨度加长而呈指数增长；如果一个系统当前的不确定性增加，则其未来各时点的不确定性均相应增加。伴随着技术的快速进步和人类活动强度的迅速增大，不仅人类社会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不确定性迅速增加，而且人们对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后果也存在着大量的无知，“人们不知道那些东西是不知道的，当基于我们认为我们知道的东西所进行的

行动或所作出的承诺的程度增加时，这种无知的程度也随着增加”（B.Wynne,1992）。由于不确定性和无知，要使发展能够持续下去，人们必须采取新的方法和途径，“可持续发展”思想与战略便反映了人们的这种努力。

3. 可持续发展

自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于 1987 年发表那份著名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以来，可持续发展思想与战略就被看作是通向未来的一种崭新道路。这一报告提出，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人类需求和欲望的满足是发展的主要目标”，“可持续的发展要求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需要和给全体人民机会以满足他们的要求较好生活的愿望”，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应进行“经济和社会循序渐进的变革”（WECD, 1987）。而在世界自然保护同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发表的著名文件《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中，则将可持续发展界定为“在不超出支持它的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的情况下改善人类生活质量”，并提出可持续社会要得以生存下去，必须遵循以下九项原则：（1）尊重和保护生活社区；（2）改善人类生活质量；（3）保持地球的生命力及多样性；（4）对非再生资源的消耗降低到最低限度；（5）保持在地球的承载能力之内；（6）改变个人的态度和行为；（7）使社区关心自己的环境；（8）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框架结构，将发展和保护结合起来；（9）创建全球性联盟（1992：1~5）。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所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进一步将可持续发展阐述为“人类处于普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他们应享有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为了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世在发展与环境方面的需要，求取发展的权利必须实现”。

显然，可持续发展是由“发展”和“可持续性”这两个核心概念所共同界定的，其内涵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发展机会、权利与义务的公平性。人的“生存、自尊、自由”的机会和权利是发展的核心，而发展的资本是这种机会和权利的表征，这些资本不仅应在当代人之间公平分配，在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也应公平分配；而在人类享有公平权利的同时，各个社会成员和集团也应对可持续发展承担平等的责任和义务；（2）发展过程的可持续性，包括经济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生态可持续性和发展过程中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协调。其中，社会可持续性是可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与归宿；经济可持续性是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手段和前提；而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抗逆性，将发展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的长期承载容量之内，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则是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3）发展战略的全球共同性。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生态环境的全球变化，只有建立新的全球伙伴关系，采取全球共同行动，才能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4）发展目标的需求性。发展是以满足全体人类（当代人与后代人、穷人和富人）的基本需求、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为目的的，世界银行在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管理相互依存的基础上，将发展定义为“包括物质消费、教育、医疗卫生和环境保护等内容的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1991：31）。然而，人类物质消费的指数增长是不能持续的，因而，人类的需求应依人类生存的目的以提高生活质量为目标，而不应盯在物质财富的扩张上，应将消除贫困，改善环境，优先满足穷人的基本需要，增进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任务。（5）发展方式的社会经济可控性。不可持续性是人类社会行为的结果。人类通向未来的道路取决于人类的社会经济行为方式，虽然未来是不确定的甚至是无知的，但人类可以调节自

身的行为来减少其不确定性和无知，放弃不可持续的行为方式，如转变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加强科学研究，将环境与发展内涵纳入决策过程，采取预防性原则，保护社会文化和生物的多样性，促进政策目标与政策手段的一体化等。

可持续发展将人类福利、社会经济水平、资源与环境管理、环境价值伦理、社会公众参与、科学与政策制定等一系列问题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并以经济—社会—自然复合系统这一复杂巨系统作为分析对象，因而它必然是许多复杂矛盾的对立统一：（1）近期利益与长期目标。可持续发展追求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期目标，关系到后代人的利益，而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人们在决策中，往往重视近期利益而忽视甚至轻视活动潜在的长期影响。因此，在可持续发展决策中，如何协调近期利益和长期目标的矛盾，对不确定性或无知作出科学的评估，就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2）宏观系统与微观行为。可持续发展涉及到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污染、资源枯竭、贫困以及全球安全等宏观的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却与人类社会的个体和组织的微观行为有关。由于外部性、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影响，微观行为很少关心其行为的宏观结果。同时，由于宏观系统行为并不是各子系统行为的简单集合，根据子系统行为来推测宏观系统所形成的“合成谬误”可能会导致荒谬的结果。因此，如何将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全球环境系统分析，与社会科学基于对个人、团体和机构所进行的微观研究相结合，将宏观目标与微观目标相统一，也成为可持续发展决策的关键。（3）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虽然结束了长期以来把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相互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依然存在，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既不能走工业化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又不能不把“发展”置于优先位置。既然众多经济活动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损害，保护环境又离不开经济发展，那么如何寻求二者的平衡点就成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的关键。“可持续发展指标”的量化、“多目标决策分析”、“最大可持续利用”概念、“预期效益”理论、“最小数量安全标准”等，均反映了人们的这种努力。（4）效率与公平。效率与公平均是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但二者之间从短期看又存在突出的矛盾。从经济学的意义上，市场理性可以促进增长和效率，但会造成不公平，而不公平是造成贫困、进而造成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政府干预和管制虽有利于公平和环境保护，但由于存在“政府失败”，因而会造成效率损失，效率损失又会造成资源浪费。因此，如何在可持续发展中兼顾效率与公平、政府与市场，是人类可持续发展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

三、乡村可持续发展

1. 农业与乡村综合发展

传统意义上的乡村被称为农村，人口稀少、区间隔离、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基础、人民生活基本相似是其主要特征。在传统农业社会，社会分工水平较低，乡村经济是传统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型经济。在西方发达国家，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传统农业虽然逐步实现了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但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乡村经济的单一化和城乡的分离。50年代以来，农业分工的深化、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发展、逆城市化和郊区化的不断推进，乡村经济开始从单一化的农业经济走向多样化的综合发展。如美国1969—1979年间，全国建筑业和加工业从业人数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2.8%和0.5%，而同期乡村建

筑业和加工业从业人数则分别增长了 4% 和 1.7%；1982—1986 年间，这两个增长速度虽下降为 3% 和 1.4%，但仍明显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宣杏云、徐更生，1993：83）。在许多发展中国家，50~60 年代，受传统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的影响，城市偏向和二元结构的强化并没有带来农业的发展和乡村的繁荣。相反，贫困、失业和收入不均诸问题在乡村变得更为严重（苗长虹，1997：36）。因此，自 60 年代末期以来，许多学者在强调农业发展重要性的同时，也注意到农业单一发展战略的局限性，开始重视乡村综合发展的必要性。沃特斯顿认为，发展计划应重视农村的整体发展而不单单是农业发展。农村发展是多种部门的活动，除了农业发展和农村工业外，还包括建立或改进社会基础设施或基础结构（学校、诊所、道路、通讯和自来水等）以及福利事业或福利规划，其首要目标是丰富农村居民的物质和社会福利。沃特斯顿依据对中国、坦桑尼亚、以色列等国家几百个农村发展的经验观察，提出了农村发展取得成效的必不可少的 6 项因素：劳动密集型农业；使用劳动力多的小型开发工程；面向农村的小规模轻工业；自力更生；适当的体制和组织安排；建立小城镇、大城镇等各级发展中心，以弥合村庄和大都市之间的巨大差距（1984:307-316）。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也提出了与沃特斯顿十分类似的观点。他建议，应加强农村的综合发展和综合建设，包括重视农业发展、积极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农村人口的生活环境与生存条件；努力缩小城乡就业机会的差别，进而减轻城乡收入的不平衡性；改革以追求学历为目标的教育制度，调整教育结构，发展实用性强的中等及职业教育，为农业及农村发展提供人才（M.P. Todaro, 1981）。60 年代以来东亚地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乡村经济综合发展的实践成就和经验，也进一步说明了乡村综合发展的重要性与可行性。1991 年，世界粮农组织在荷兰召开的“农业与环境”会议通过的“登博斯”宣言和议程中，将增加粮食生产、促进乡村综合发展、合理利用与保护自然资源作为可持续农业和乡村发展的三大战略目标。可见，农业和乡村综合发展，是解决贫困、增加就业、提高农民收入等难题的必由之路。

2. 乡村可持续发展

任何物质过程均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的，可持续发展也不例外。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一种新战略，无论就整体而言，还是就部门而言，都必然落实到具体的地域空间，即一定的区域。“区域的发展问题是全球发展问题的缩影。区域可持续发展是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孙鸿烈，1997）。乡村无疑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地域空间，它是人类食物的来源，又是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基础。因此，与城市相比，乡村对全球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更为重要的基础作用。没有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城市也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全球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诸多问题中，乡村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也许最为巨大。这些挑战主要表现在：（1）贫困与人类健康。贫困并非只是乡村的专利，但全球贫困人口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绝对贫困人口均无例外的集中在乡村。由于贫困，人类健康受到严重威胁。根据有关资料，1990 年世界人口 53 亿人，其中穷人有 20 亿人。大约有 10 亿成年人不能读写，15 亿人没有安全的饮用水，大约 1 亿人完全无家可归，10 亿人忍饥挨饿，1.5 亿 5 岁以下的儿童营养不良，每年有 1290 万儿童出生后不到 5 年而死亡（韩东娥，1996：56）。

（2）人口增长。人口高速增长，严重地说是“人口爆炸”，是人类社会不可持续的关键因素，而乡村人口的高出生率无疑是全球“人口爆炸”的重要成因。（3）脆弱生态系统

和森林的破坏。脆弱生态系统通常包括沙漠、半干旱土地、山区、湿地、小岛屿和某些沿海地区，这些生态系统和森林的破坏，与不可持续的农业活动和土地利用密切相关。（4）生物与文化多样性的衰减。地球上基因、物种、种群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可变性，大部分存在于森林、热带和亚热带稀树干草原、牧草地和牧场、沙漠、冻原、河流、湖泊和海洋等自然生态系统之中。而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生境受到破坏、过度开发、污染和不适当引进外来植物和动物等。显然，这些原因与人类社会的农业活动密切相关。乡村作为农业文明的发祥地，与生物多样性一样，具有丰富的文化多样性，而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使这种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5）环境恶化与发展对城市和工业化国家的依附。受人口增长和贫困的制约，乡村的发展往往会以资源的破坏和环境的恶化为代价。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偏向政策的作用下，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乡村既要以不平等的交换为城市和工业化国家提供发展的资源，又必须承受来自工业化、城市化所造成的环境污染。这种双重的环境压力和乡村发展对城市及工业化国家的依附，从根本上阻碍着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第二节 乡村可持续发展分析的理论框架

一、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因素

乡村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综合的动态的过程。乡村作为经济—社会—自然复合系统，其可持续发展受众多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的决定。根据萨拉格丁对资本的划分和发展可持续性的理解（I.Sarageldin,1996），结合乡村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可以将有关因素归纳为以下5个方面。

1. 人口与人力资本

可持续发展问题首先表现为人口问题，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首要论题。在关于人类未来的讨论中，无论是“悲观派”，或者是“乐观派”，无不以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为出发点。从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到梅多斯等人的《增长极限》和埃利希的《人口爆炸》，均将人口激增看作是粮食短缺、资源耗减、能源紧张、环境污染的首要根源；而从凯恩斯的《人口增长缓慢的一些经济后果》和汉森的《人口增长的下降与经济进步》，到西蒙的《最终的资源》及西蒙和凯恩等人的《资源丰富的地球》，则从市场理性、资源替代、技术进步出发，认为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发展。由于人口范畴不仅包括数量而且包括结构与质量，人口数量是否适度，又与环境容量和经济技术水平有关，因而极端的持有人口增长有害或者有利的观点，均无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从可持续发展出发，实施人口控制，优化人口结构，大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努力增加人力资本存量，对乡村可持续发展才是有益的。舒尔茨、贝克尔的“人力资本理论”和罗默、卢卡斯等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均说明，人力资本积累及其收益递增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

2. 资源、环境与自然资本

资源与环境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自然资源按其可再生

性可分为两类：可耗竭资源和可更新资源。前者的蕴藏量在任何对人类有意义的范围内由于不能增加，因而会随着资源的开采而逐渐枯竭；后者的蕴藏量由于可通过自然力而加以保持或增加，因而在合理开发利用的条件下资源可以得到持续利用。在乡村可持续发展中，可更新资源的持续利用尤其是土地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的持续利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因为，作为自然与经济复合过程的农业活动要得以持续发展，就必须以可更新资源的持续利用为前提。同时，由于可更新资源易于受到破坏，自然的更新又需要一定的周期，因而这些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不当利用，往往会导致长期的、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灾难性的后果。自然系统不仅为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稀缺的资源，而且为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生态环境。人类作为大自然中的一员，既依生态环境而形成演化，又依生态环境而生存发展。但令人担忧的是，伴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也日益加剧，而且这种污染和破坏的一些环境后果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甚至人类对某些后果根本就是无知。对乡村生态环境系统而言，其可持续性既受乡村本身不适当的资源开发利用及乡村其它活动的限制，而且受城市污染扩散的严重阻碍。从资源环境价值看，自然资源作为发展的资本已为人们所公认。其实，生态环境也是发展不可缺少的资本。皮尔斯等人认为，资源环境价值包含多种价值成分，其主要类型可分为4类：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选择价值和存在价值（Pearce and Turner,1990；Pearce and Puroshothaman,1992）。例如，清洁舒适的环境和优美的自然景观赋予了环境的直接使用价值，环境对污染净化吸收能力和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等生态功能赋予了环境的间接使用价值，环境未来的直接或间接使用价值赋予了环境的选择价值，而人类“尊重自然”的环境伦理赋予了环境的存在价值。资源环境作为有价值的自然资本，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投入。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自然资本同人造资本、人力资本等存在着替代关系，但由于资源环境的唯一性和低于某一临界状态后的不可逆性，人造资本、人力资本同自然资本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人造资本、人力资本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以自然资本为基础。因此，在可持续发展中，自然资本是不能被完全替代的，其重要的间接使用价值、选择价值和存在价值，要求人类社会必须保持一定的自然资本存量，保证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一些学者认为，要保证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需要做到：（1）使用可更新资源的速度不超过其再生速度；（2）使用不可再生资源的速度不超过其可再生替代物的开发速度；（3）污染物的排放速度不超过环境的自净容量（J.P. Holdren ,G.C.Daily and P.R.Ehrlich,1996）。目前，人们对生态可持续性的条件仍存在着不同意见，对自然资本的核算也存在着许多困难，但人们在有限的知识范围内，认为人类要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就必须改进系统状态信号将资源环境纳入发展的成本；加快对环境受压的反应时间，及时作出技术和组织上的安排；尽可能的减少对于不可更新资源的利用；严防对可更新资源的侵蚀；要以最大效率利用资源；减缓直至最终停止人口和物质资本在量上的指数增长（潘家华，1997：203~205）。

3. 技术、经济与人造资本

人类社会能否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从物质过程上讲，关键取决于人类社会的技术经济方式。联合国《21世纪议程》指出：“全球环境不断退化的主要原因是非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尤其是工业化国家的这类模式”。从生产模式看，迄今人类社会的技术进步具有严重的不对称性，市场本身也具有严重的不对称性。市场机制促进了利用环境资源生产商品和服务的技术进步，而限制了那些具有效用的自然现象的生产技术的开发；市场机制

促进了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的创新,而限制了环境保护技术的发展;市场机制对私有资源的配置较有效率,但对于公共资源的配置不仅无效,而且会造成过度开发利用;市场机制强调对具有市场价值的资源的利用,而不能对非市场交易资源施加保护(潘家华,1997:29~36)。从消费模式看,工业化、现代化社会崇尚的是“线性”模式,这种模式在市场机制的激励下,不断地将自然资源转化成产品和货物以满足人们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而用过的物品则被当作废物而抛向环境(张坤民,1997:103~104)。可见,传统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是人类对物质财富的无限追求不断刺激对自然资本的利用,为提高效率,则不断将自然资本转换成人造资本,从而加速对自然资本的消耗,进而对资源环境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因此,转变人类社会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开发有利于环境的商品和服务,加强“清洁生产”技术的研究和推广,促使人造资本以环境无害化的方式进行生产,改进人造资本质量,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当然,现实社会也存在着多种近于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尤其是在乡村农业生产(如生态农业)和消费活动中。问题是在发展中国家乡村向城市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沿袭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过程所采用的“石油农业”之路,由于其能耗高、污染重、对人造资本依赖程度大,因而是不可持续的;另一方面,由于乡村人口多,经济发展水平低,贫困问题严重,发展所依赖的人力资本和人造资本均非常稀缺,不得不以对自然资本的过度消耗来维持生存,因而持续的贫困使乡村发展也不可持续。因此,对乡村可持续发展而言,提高农民收入,消除贫困,增加满足基本需要的消费,仍是发展的根本任务。而在“绿色革命”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技术;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基础上,积极发展非农产业,不断增加有利于环境的人造资本的积累,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4. 制度与社会资本

人力资本、自然资本、人造资本虽均是可持续发展所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但仅仅有这些资本还不能保证发展的实现,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发展因素——制度,以实现不同资本的合理配置和最优利用。制度作为社会中个人遵循的一套行为规则,无论是正规的法律政策,还是非正规的文化习惯,均对资本的形成、利用和不同资本之间的配置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扩展人类选择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目标,而制度正是由于在扩展人类选择、提高人的经济价值方面的作用而受到现代经济学家的重视。制度与其它资本形式一样,也是稀缺的,存在着供给与需求,因而被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称之为“社会资本”。对于可持续发展而言,由于它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是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人造资本的一种新的认识方式和利用方式,这种新的模式既需要以新的规则来扩展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选择,又需要以新的规则来约束人类的不可持续的活动方式。因此,新的制度需求迫切需要新的制度供给。对乡村可持续发展而言,在严峻的挑战下,如何实施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创新,不断提高社会资本质量,是当前学术界亟待加强研究的一个前沿性课题。

5. 城乡关系与贸易

如前所述,乡村是一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乡村、城市共同构成了乡村—城市连续体。由于城乡的相互作用和区域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是在城乡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乡村可持续发展不仅仅决定于其自身的发展因素,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于城市和贸易对乡村的影响。发展经济学中的“城市偏向”理论和“依赖”理论,很早就

对乡村和发展中国家“欠发达”的原因，分别从城市和贸易作出了有力的说明。目前，“城乡一体化”、“城乡协调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建立“新的全球伙伴关系”、“提供协调发展与保护的国家网络”、“创建全球联盟”等呼声，又进一步说明，在可持续发展这一关于人类未来的讨论中，城市与乡村的相互依存、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全球的相互依存是极为重要的。由于在城乡相互作用和贸易中，乡村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其较低的发展水平与所承担的较大环境责任很不相称。因此，改善城乡关系和贸易条件，强调城市对乡村、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与发展领域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对发展中国家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二、中国乡村可持续发展分析的理论框架

1. 人地关系

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命题。在可持续发展研究中，人们对这一古老命题赋予了崭新的含义：现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发展问题，被看作是“人地关系失调”的结果，而协调人地关系被看作是可持续发展的中心任务。在吴传钧提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之后（1991），中国地理学界大多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作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并将“区域 PRED 系统”、“区域人地关系系统”、“区域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等作为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的基本框架。如王黎明在《区域可持续发展》一书中，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视角，对现代人地关系范式、人地系统演替机理、人地系统研究方法、人地系统 PRED 构型、区域形象等论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毛汉英主编的《人地关系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王劲峰等著的《人地关系演进及其调控》、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主持完成的“地球表层动态机制与人地关系系统调控研究”等成果，均将人地关系作为分析的中心和调控的对象。因此，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或称区域人地系统，是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不可缺少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框架。

2. 人与人的关系

经济学通常用孤岛上“鲁宾逊”的故事来说明每个决策者面对的选择和约束。如果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其发展决策显然取决于人类的偏好和其所面对的技术和资源约束。因而，在鲁宾逊世界中，人地关系确实构成了鲁宾逊持续生存与发展的核心。如果鲁宾逊是理性的（尽管这种理性是有界的），那么他就能通过偏好的改变和技术的改进来不断的调整人地关系，以实现他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显然，鲁宾逊世界不需要制度。目前，地理学对人地关系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多数研究所持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框架，比较接近于鲁宾逊世界这样的技术假设。然而，鲁宾逊世界毕竟仅仅是一种虚构，从人类的历史起源来看，人始终生活在一个社会中，并且不得和其他人发生关联。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对于社会中具有“有界”理性的个人，一方面，由于个人的生命周期、健康和生产过程的不确定性以及自然灾害等原因，人需要制度来促进与其他人的合作，从而为确保年幼和年老时的安全作好准备，拉平随时间而变化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并获得对风险和灾难的保障；另一方面，由于规模经济和外部效果的存在，人需要制度将这些收益内部化以增加个人的福利。因此，正是出于安全 and 经济两方面的原因，人们才需要彼此交换货品和

服务并使制度成为不可或缺（林毅夫，1994：371~418）。可以发现，从鲁宾逊世界回到人类社会的现实世界，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不仅仅取决于人地关系和起决定作用的技术，而且更重要的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以及约束这种关系的制度框架。因此，在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应对人与人的关系和约束这种关系的制度给予高度关注。针对地理学强调人地关系而忽视人与人的关系这种研究状况，苗长虹在“组织活动、制度和可持续发展”一文中指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人的发展、经济增长及其代际、代内和空间公平，它们显然属于人与人关系的研究范畴，而制度在约束人与人的关系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就象‘产权’本质上是‘人与人的关系’而非‘人与物的关系’一样，现代‘人地关系’矛盾的实质在于‘人与人关系’的不协调：一部分人和当代人需要的满足以牺牲另一部分人和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同时，历史地看，人类社会的发展本质上是通过制度和技术变迁实现的；但从技术发明和创新的实现还需制度的激励和保护这一意义上，制度对长期发展起着比技术更为根本的决定作用”，“因此，只有将制度纳入可持续发展的分析框架并将其放在中心位置，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 PRED 协调问题。在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地理研究中，应象企业地理使经济地理学‘仅仅对物的分析转移到对人及社会组织机构的关注’那样，在继续深化‘人地关系’研究的同时，更加关注‘人与人关系’尤其是‘组织活动和制度’的研究”（苗长虹，1998：30~35）。

3. 可持续发展分析的一般理论框架

如上所述，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涉及两方面关系：人地关系和人与人关系。因此，一个可持续发展分析框架至少应包括如下 5 个方面：(1)可持续发展的目标；(2)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约束与制度变迁；(3)可持续发展的技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及其变化；(4)可持续发展中的个人与组织活动；目标、行为和结果；(5)个人与组织活动结果同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偏差和政策的制定。这 5 方面间的内在关系可用图 1-1 简要表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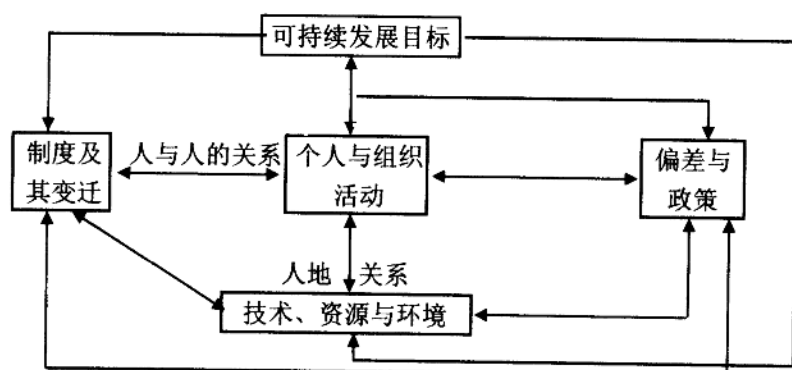


图 1-1 可持续发展分析的一个理论框架

4. 中国乡村可持续发展分析的理论框架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和乡村大国，而且农业和乡村正处于全面快速的转型时期。因此，乡村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研究的论题复杂多样。本研究拟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和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作为理论基础，以人地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协调为目

标,以个人和组织活动的分析为核心,对决定和影响乡村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本、自然资本、人造资本、社会资本、城乡关系与贸易等因素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并将重点放在社会资本既制度的选择与创新方面。由于人与组织活动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方面有着不同的行为特点和行为规则,故本研究重点讨论在中国乡村可持续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一些关键领域,它们是:(1)人口与贫困;(2)资源与环境,特别是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3)农业产业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4)乡村工业化与乡村工业的可持续发展;

(5)乡村城市化与乡村住区可持续发展;(6)城乡关系和贸易。在这6个领域中,人口可持续发展与消除贫困、乡村城市化与乡村住区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乡村社会可持续性分析的主要内容,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环境保护构成了乡村生态可持续性分析的主要内容,农业产业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乡村工业化与乡村工业可持续发展、城乡关系和贸易等则构成了乡村经济可持续性分析的主要内容。在乡村可持续发展中,社会系统、经济系统和自然系统是相互作用的,社会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和生态可持续性相互依赖的。因此,上述领域中的任何一个均不是孤立的,均与社会、经济、生态的可持续性紧密相关,在对上述6领域分析过程中,始终应将人地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作为分析的主线。中国作为农业和乡村大国,地域空间差异十分显著,进行地域类型和地域差异分析对乡村可持续发展研究是不可或缺的,但限于本研究的重点是对中国乡村可持续发展进行理论分析,所关注的是中国乡村的总体和一般状况,因而地域类型和地域差异分析没有作为本研究的主题。综上分析,本研究对中国乡村可持续发展分析的理论框架可用图1-2简要表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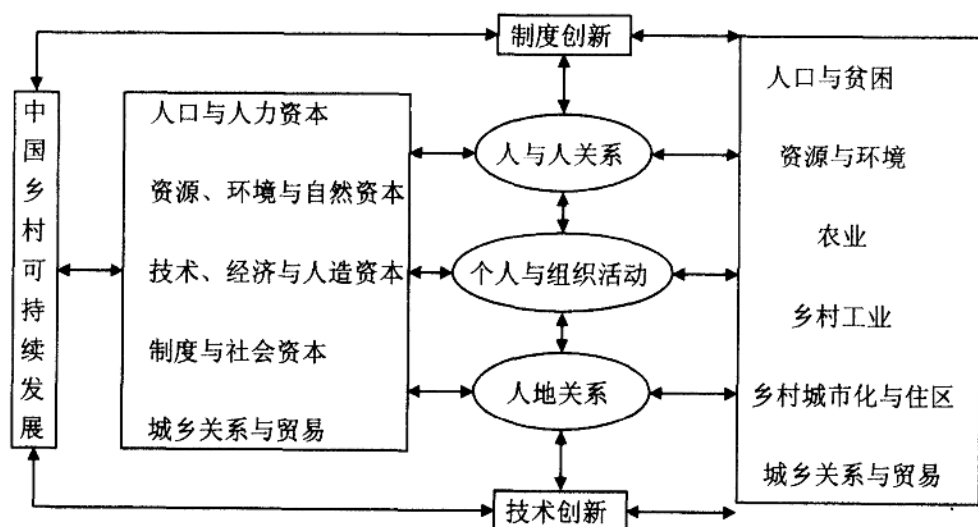


图 1-2 中国乡村可持续发展分析的理论框架